

城市社区治理下民间武术发展路径

徐飞¹, 花家涛²

(1. 安徽建筑大学体育教学部, 合肥 230601; 2. 安徽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等方法,从社区治理的视角,以“三社联动”为分析框架,通过对安徽省非遗“张氏大洪拳”个案的调查,探究当前城市民间武术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城市民间武术由“乡土拳种”到“城市技艺”再到“文化遗产”的谱系化传承,彰显其在传统伦理本位基础上衍生出融日常生活、社会进阶与公共理性为一体的传承特征;在社区治理中,城市民间武术主动进入社区,将大众健康休闲与娱乐教化融入日常生活,并在生活化服务中增强城市民间武术共同体的生命力。研究认为:在“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中,城市民间武术的社会化存续,需要将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建制相结合,在社区文化共同体的营造与服务社区居民的平台建设中,提高城市民间武术共同体的社会服务水平。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民间武术;共同体;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9)03-0078-06

Development of Civil Wushu in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XU Fei¹, HUA Jiatao²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ifei 230601,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reviews on the inheritance of Civil Wushu from perspective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a frame of "Interactions amo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Work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civil Wushu in urban communities passes through the stages from "native practice" to "urban art" to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reveal the inheri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daily life, social progress and public reason that derives from traditional ethics. In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folk Wushu is actively introduced into communities, which integrates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nto their daily life and enhances the vitality of urban folk Wushu communitie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folk Wushu needs to combine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system and the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to improve the folk Wushu communities' social servi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ervice platform.

Key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civil Wushu; communit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社区,既是政府重要的工作领域,又是大众日常的生活空间。我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始自1986年民政部提出“社区服务”要求:以社区为平台,承接原先由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承担与处理的部分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历经数十年发展,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提出“社区建设”任务:政府指导与社会共同参与相结合,充分发挥社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的“三社联动”机制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在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社会发育”2种取向的持续双

向互动^[1]:前者通过政权重心下沉来加强对基层社区治理,后者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形成资源汲取与利益表达机制。因此,社区居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需求是在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文化生活中得到满足并与时俱增的。为此需要通过社区组织与文化建设来构建政府与社区间相互合作的社区自治系统^[2]。

作为社会性生活文化的非遗一直生存于城市居民生活场域的社区中。社会转型使得非遗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转换、调适的变迁过程中,并在延续其主要原生功能的前提下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

收稿日期:2019-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民间体育社区治理(17BTY113)。

作者简介:徐飞(1974—),男,安徽肥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武术文化与武术教学。

文化功能,即在表征农耕文明精神信仰与风俗习惯的底色中日益增长出城市化的公共精神与社会进阶的积极复兴。非遗在这种再生产的力量中主动或被动地获得传承与发展^[3]。城市民间武术作为非遗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是社区生活文化,还是一种社区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式。既往城市民间武术研究认为:在非遗保护前提下,城市民间武术依托学校教育、大众锻炼与国际化传播等途径来实现传承^[4];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以来,城市民间武术不仅是政府日益关切的现实问题,还是挖掘武术文化资源、扩大全民健身受众的实际助手,更是社区文化品牌建设的实践抓手^[5]。这些研究对推动城市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的学理建构与实践指导,但尚未拓展至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中,并落脚于社区治理来具体研究其发展路径。

本研究在文献资料梳理的基础上,通过2015—2018年历经4年的安徽省合肥市“非遗”项目“张氏大洪拳”的田野调查,以社区治理的视角,在“非遗”谱系化、生活化、社会化的三重维度上分析框架其经由“乡土拳种、城市技艺、文化遗产”的历史过程,以及在“公园、校园、赛场”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实践中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具体做法,从而取得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途径。

1 城市民间武术谱系化传承

作为一种乡村自治方式,民间武术是对中国社会礼治传统的承接与活用,并在国家治理与地方民俗发展之间建立良性的共生互动关系^[6]。在城镇化发展中,乡村民间武术的“组织秩序、文化信仰和活动方式”随着城市移民而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并在“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的双重作用下,被构建成独具特色的城市公共文化。城市民间武术已然成为一个融入多元生活方式的文化谱系,即城市民间武术事项在结构上是城市文化“整体性与多元性”的表征、在功能上是民间组织与社区居民“互动性与认同性”的表征^[7]。

1.1 乡土拳种的生存理性与伦理本位

合肥市张氏大洪拳系张世宏之父张传正(1916—2001年)由江苏传至合肥。访谈获悉:张传正祖籍江苏沛县朱寨乡人,1927年师承刘修信(1901—1968年),精习武当大洪拳械十余载,又在其师引荐下受益于三晃膀大洪拳名家邓洪先,尽得三晃膀之精要(2位师傅均是当时沛县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他俩互相授艺,并约定两家拳并为一家拳,统

称大洪拳)。张传正深谙大洪拳械的精髓,出师后曾游历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广西、广东等省,寻师访友,兼收并蓄其他拳种优点。1950年张传正由南京浦口至合肥火车站工作,成立铁路业余武术活动中心,开始在合肥设场收徒,该拳便在合肥传播开来。

由于拳师们长期生活在特定地域上,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相对孤立的武术圈子。田野调查从张世宏处获悉:江苏丰县顺河乡仇庄的张建(1786—1865年)自14岁起,师随李泰习三晃膀大洪拳13年。李泰为河北恩县甜水铺人,曾任清朝皇宫禁卫武教头,因被陷害而于1799年南下逃难于江苏丰县顺河乡仇庄村,以行医与打短工为生。偶遇张健之父张士义,遂成挚友。经张士义引荐,李泰在财主资助下收徒授艺18人,张健尽得真传。1812年秋,李泰获悉风声已过,便回家探亲。临行之际,李泰嘱咐众弟子,因张健家境最差,规定只有其为养家糊口可以执收徒传艺之业。并在送师途中的十余日内,不仅将大洪拳技法倾囊相授,还将武功秘药和拳路谱牒交给了张健。张健牢记恩师之训,日夜苦练功夫,终使大洪拳功理、医法、技击融会贯通,尤其剑法无人匹敌,苏、鲁、豫、皖武林界尊称其为“剑爷”。为不负师训,使三晃膀大洪拳发扬光大,张健开门收徒,艺成出师者众多^[8]。

从张氏大洪拳的传承谱系中可以发现,乡土拳种的存续体现出“生存理性”与“伦理本位”的“生养制度”：“生成”强调其以“生存技术”作为原生性依据,“养成”强调其在累递传承过程中需要许多阶层或群体以及观念或信仰加入,反映乡土拳种传承时间越长,融入因素越多的价值累叠特征^[9]。其“伦理本位”不仅体现出一套独特的权利义务关系,还表现为将尊师与对拳种的敬畏相统合于日常生活,严格限定其行为方式。张健实现了对李泰的拳种传播之伦理义务,成为三晃膀大洪拳传播丰县及周边之始祖。在熟人社会里,对乡土拳种继承的责任与个体生存理性,成为人际关系的礼俗习惯。这种朴素道义和情感义务,既支撑着乡土拳种的永续实践,又成为其生养逻辑。

1.2 城市技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进阶

张氏大洪拳从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是乡土拳种转型为城市技艺的文化谱系过程:凭借对武术技术的反复锤炼与对师承的伦理义务,使动作内涵定型为身体技术的一部分而代代相传,并在日常生活的身体实践中成为社会阶层跃升的途径。调查获悉,张传正初到合肥火车站工作是做装载工,搬运

之中因工作需要而显露出功夫的底色(一人扛起数倍于工友的货物)。当其拥有一身好武艺被众工友知晓以后,便在单位文体活动中崭露头角,其表演的大洪拳及其刀枪棍棒各种器械成为压轴内容。名声传播开来,最多时将近千人跟着打拳。

张世宏自述:“我几岁时跟着父亲后面练着玩,慢慢地对大洪拳产生了兴趣。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人要与我比武,人家觉得我父亲会拳,我也应该有两下子。所以我觉得不能丢父亲的脸,于是练起拳来也更加勤奋。”自1976年始,张世宏“下放”至安徽固镇农场5年,坚持练拳而成为工友中的名人,返城之后在合肥火车站工作。2001年其父离世,张世宏为了完成其遗愿——使曾经辉煌而眼下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拳种发扬光大,便产生了强烈的传承大洪拳的责任感。在尝试开大洪拳训练班失败之后,于2003年开始广收弟子,尤其是接收了4位高校武术教师作为入门弟子,传拳大为改观。2013年初,主动辞职离休,一心发扬拳法;师徒共同努力,积极“申遗”,当年以“张氏大洪拳”为名,被录入合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作为身体技术的大洪拳,功法上强调调动内气,以气发力;技法上以马步桩为根基,攻多崩炮,防多截肩,拧腰晃膀,肘捶相连;架势讲究八大纲领:大、小、屈、伸、刚、柔、发、聚(大则气运周身,是静中之动;小则芥子藏身,是动中之静;屈是屈中有伸;伸是刚中有柔;刚是水火济济;柔是气海丹田混合之气;发是气随捶发,足落捶打;聚是聚于气海,存于丹田(张世宏口述))。在经历“三年架子两年锤”之后,一方面提高身体运动素质与集体健康促进,另一方面大洪拳的架、锤对心理与精神层面产生稳重与纪律感,提高内在秩序感。调查得知,张氏大洪拳门下弟子就有通过多年习练该拳而考上体育院校,甚至成为飞行员的。其他不少师兄弟在社会各个阶层(如火车站领导、公安干警等)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作为城市技艺的民间武术,其社会功用较好地解决了技艺之“可得”与“善用”的统一问题。城市民间武术习练者在以生活为质料的持续训练中习得技艺之中蕴含的德性,从而实现其“技艺”人生^[10]。

1.3 非遗项目的生活回归与公共理性

张氏大洪拳继2013年被录入合肥市非遗名录,于2017年10月又入选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即从隐蔽的边缘文化成为公开的公共文化,一改以往在名称上游离于“三晃膀大洪拳”与“武当大洪拳”之间的尴尬与不便。作为“非遗”项目的张氏

大洪拳,在向政府“宣誓”时承诺,其共同体“为武术文化的代代相传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一如既往传教弟子,培养下一代武术苗子,为全民武术健身运动的开展与社区体育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安徽省武术协会与武术管理中心机构代表也表明了政府的主张,在认同张氏父子为传统武术的传承做出贡献的同时,希望其为安徽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作为安徽省非遗项目的公共文化,张氏大洪拳共同体将乡土拳种的传承伦理义务和城市身体技艺,与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结合起来。政府在近年来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提出了生产性保护方式,而生产性保护最重要的主体是民众而不是政府。因此,非遗保护要与当前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需求中持久传承^[11]。政府不仅通过资助的方式,鼓励张氏大洪拳以代表合肥市的名义参加境内外各项传统武术竞赛,还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要求张氏大洪拳在市区开展各项武术汇演与各种武术健身指导活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和效果。而张氏大洪拳共同体则借助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扩大传播范围,找回武术爱好者,还吸引了政府组织来的广大群众成为新的武术爱好者,同时在服务过程中锻炼了本门弟子,巩固了共同体的凝聚力,起到了传承、保护和发展自身的目标。“非遗”化的张氏大洪拳公共文化活动也更好地满足了合肥市,特别是瑶海区群众的健身与文化需求,实现了自身的群众化、生活化目标。

2 城市民间武术生活化服务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和政府在功能上互补。鉴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的不足,社会组织应该更多地扮演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12]。在目前的城市社区发展中,社会力量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愈来愈重要,而社区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部门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公共领域,为城市社区治理和良性发展提供重要动力^[13]。张氏大洪拳在“公园、校园、赛场”的结构主义实践中服务于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并在健康、休闲、教育及文化欣赏等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取得可持续发展机遇和传承动力。

2.1 服务城市公园武术健身人群

城市民间武术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健身休闲中实现了自我生存空间的拓展、受众范围的扩大、文化共享的加强。阳光充足、空气清新、植被葱葱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居民开展健身休闲活动的基本条

件,并且直接影响到健身休闲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因此,城市公共空间重构对城市民间武术提供了生存基础。作为我国4个最早“国家园林城市”之一,生态城市合肥建构了“园在城中、城在园中、城园相接、园城一体”的城市格局。在瑶海生态公园内,周末聚集大多在7~17岁、身着黄色练功服的张氏大洪拳研究会习武弟子们,在该研究会会长张世宏的指导下,习练着刀、棍、拳、镖、钩、拐等,吸引众多游园者与一些送孩子来习武的家长在此驻足观看,成为公园里的一道靓丽的“武动”风景线。

自2009年暑期开始,为庆祝安徽省第一个全民健身日,也为了扩大本门拳术的社会影响力,张氏大洪拳将在市里一个家具市场前空地上习武的“拳场”,“搬迁”到了瑶海区生态公园,在拳场周围还做了一些介绍本门拳种由来与主要内容的广告展板,组织本门弟子定时展演。从此便矢志不渝,坚持每周进行周末2天的训练,从不间断;历经6年多的发展,规模日渐庞大。习武人群主要有2种:其一为本门弟子,周末下午两时许,他们先是在张世宏老师家小区内僻静的广场上,练习本门的高级套路,之后再回到生态公园广场与社会人员一起练拳;其二为社会人员,下午四时许,主要是来自周边小区的中、小学生和极少数大学生,出于锻炼身体的动机前来习武(极少数学员准备走武术专业道路),主要习练本门的初级套路。全部习武人员都是免费学习,张氏大洪拳研究会老师们义务指导。

学员家长从事的职业比较广泛,如建筑商、汽车配件商、信息通信设备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员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等等。每到训练时间,学员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准时到场参加习练已成为常态。每次授拳内容是从基本功和基本入门套路开始:先是入门的大弟子组织社会人员练习基本功,入门的小弟子在其中充当骨干,带领练习;之后是张世宏老师传授初级套路,其弟子们指导大家练习。而传承人们则在广场较前部位习练各式套路,如张氏大洪拳特色内容关西架、关东架、三晃膀、活腰架、太平架等套路,马门锤、坡练锤、长打锤等对练技艺,牛心双拐、九节鞭、双鞭、大梢子棍等器械,以及鹰爪功、擒拿术等功法。

2.2 拓展高校武术文化传承内容

目前安徽省高校的武术教师,大多数是师范大学体育教育专业武术专修的毕业生,他们在校所学内容为武术基本功和初级长拳、24式太极拳、武术国际推广套路和少许攻防实战类技术。当他们从

事高校武术教育时,面对没有习武经历的大学生,无法就个人所能进行武术教学,原因是普通大学生没有能力或者是没有兴趣习练这些套路技术,所以存在较多改教跆拳道或散打,甚至改教别的体育项目的现象。

田野调查发现,张氏大洪拳自2003年开始,先后投师其门下的师范大学武术专业毕业生有徐飞、杜卫提、朱亚伟和张金宏4人,在拜师学艺与高校武术教学中的双向实践中,逐渐形成基本动作—基本功—动作组合—入门套路(太平架、谭腿等)—拉架子(关西架、关东架等)—器械(四门刀、齐眉棍等)—对练(马门锤)—功法训练(站桩、靠背、排打、徒手鹰爪八式功等)等练习习武步骤,并在教学相长的经验中逐渐编排出“教师好教、学生好学、竞赛好组织”的经典套路与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张氏大洪拳的“四大弟子”在考入高校之前都有一定的武术情缘,如徐飞是1986年经亲戚介绍随合肥火车站一邢姓师傅练习道家气功、陈氏太极拳和少林基本功;杜卫提出生在武术之乡砀山,从小随其表叔练习武术;张金宏从小在淮南市随安徽理工大学张老师练形意拳;朱亚伟也在中学阶段学练过武术。拜师学艺便开始了“换劲”历程。如其所言,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国家竞赛套路和散打,总体的套路难度比较大,感觉它仅仅是体育项目而已,无从感受到中国武术的“博大”和“精深”。因此,当他们再次走进课堂教学时,首先其师徒传承的文化就引起学生好奇,再加上身怀多种“奇异之技”,以及带领学生在室外习武与各种场合的武术表演,营造了一种校园武术文化氛围。

2.3 参与武术竞赛与文化展演

除了公园大众武术健身指导、学校武术教育之外,合肥市张氏大洪拳还积极参加各种传统武术竞赛。从主办者的视域来看,以拳种为竞赛单位、以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当下各类传统武术竞赛,其实是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一种抓手;而对参与其中的某个拳种传承人而言,参与竞赛却是光大门派、增加社会影响力、锤炼继承人身心、扩大自身社会资本的一种有效途径^[14]。

在2003年之前,全国传统武术比赛较少,竞赛信息传播不畅,习武群体参赛意识不强,以及参赛收费等经济方面的原因,张氏大洪拳没有参加过任何传统武术比赛。自高校武术教师群体进入该门时,以徐飞为例,从2004年开始,参加了郑州传统武术节、全国传统武术交流大会、北京东亚武术交流

大会、北京国际武术文化交流大会等全国性的传统武术竞赛,安徽、西安、江苏、浙江等地方性的传统武术比赛,获得传统拳术三晃膀、关西架,传统器械牛心双拐、大梢子棍,对练波莲捶、马门捶、梢子棍进枪、大刀枪、盘龙棍等项目,获得金、银、铜共计30余枚奖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让很多张氏大洪拳的弟子逐渐成熟、成才,成为高校教授、部队军官以及各类社会良才。

此类比赛的广泛参与,除了近10多年以来赛事较多原因之外,与该拳传承人张世宏老师以弘扬本门武术为己任的强烈而认真的决心有关。参加比赛既能在传统武术界获得知名度,也能在地方媒体中得到宣传,这无疑有益于光大门户。通过参加一系列的武术比赛,张氏大洪拳的张世宏老师获得的“双拐王”的社会声誉,门下弟子也在一些武术门户网站上展露身体技艺,使得本门拳种逐渐被社会认知,如安徽经视第一时间、安徽文体频道、合肥故事广播栏目、安徽公共频道、全球功夫网、上海东方经视、合肥晚报等媒体对本门拳种都进行了专题报道,也受邀参加社区内的各类公益表演。

从张氏大洪拳的“谱系化”传承与“生活化”服务实践来看,武者道德之善与信仰具有内在逻辑,即将自身的生存实践统一于“武化”与“文化”的结合上,表征了武者德性是个体性终极信仰,与“超越性力量、自我意识觉醒、生命价值和意义感构成”相关联^[5]。因此,契合农耕文明的民间武术德性,要积极应对如何与社会情境相契合,从而实现城市民间武者德性的必然性与道德行为的恰切性。当前国家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社区治理,而武者在服务国家建设中,以德性涵养生命情怀,缓解自身焦虑,以构建生命价值与意义。实际上此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武者德性思想对现代城市民间武术德性践行的文化召唤,成为武术传承价值层面的底色阐释,将服务社区大众日常需求与公共文化建设相结合地“累代专门”传承武术。

3 城市民间武术社会化存续

社区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体现。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的机制建设^[16]: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手段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二是通过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来激发社区活力,三是通过社工专业化服务来建构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城市民间武术在社区治理大环境

中谋求发展,同样需要通过“社区建设”“社团培养”“专业社工”的“三社联动”之社会化存续手段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3.1 作为社区共同体营造的城市民间武术服务平台

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合作精神和能力缺乏”“人际关系冷漠”“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原因主要是基于发展主义思路下城市社区治理过多“强调经济发展,忽视公共性建设”^[17]。对此,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主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推动社区公共性生长是整个社区治理的逻辑起点。落脚点则是在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社区公共领域的构建以及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上^[18]。因此,应充分发挥社区在“三社联动”中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基础性平台作用:规范社区社会组织的服务,促进社区服务的社会化,满足居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营造社区共同体氛围。

瑶海区以开展文化活动为纽带,将社区内各行各业各阶层居民联为一体,广泛开展具有共同文化观念、民俗习惯、审美情趣的公共文化服务,旨在强化社区意识,提高居民群体认同与社区文化认同。首先,针对社区中老年锻炼太极拳、年轻人活动不足的现状,张氏大洪拳积极开展年轻人武术健身活动。近8年坚持,当初的初学者已成为社区内传拳授艺的骨干,实现了社区居民服务社区的目的,因为他们既是社区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区文化的受益者;其次,发挥社区人才优势,在传统节日日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张氏大洪拳发挥自身武术文化特色,一方面坚持日常的武术健身指导,另一方面则做好节庆日的武术文化表演事宜。与社区内其他文体组织一道,每年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8月8号健身日等,张氏大洪拳都会参与社区文体集中表演活动,向社区居民传播健身知识、输送武术锻炼技能、提供精神消费产品,最大限度地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

3.2 作为社区体育组织的城市民间武术团体

作为社区治理重要载体的社会组织,必须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社区体育组织是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一,亦是“三社联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凭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组织团队,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原理、要素、路径方面实现社区治理专业化。在体育成为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时,社区体育组织既是社区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纽带,其所产生的邻里关系、公共精神、参与实践等皆是社区有效

运转的基石,又是推动社区治理转型与创新的重要条件。作为合肥市瑶海区文体组织之一,张氏大洪拳在服务社区日常生活中促进拳种共同体成长。

张氏大洪拳在社区日常工作与节庆日期间举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中锤炼队伍:在华府竹丝苑社区的非遗传习所内,针对社区居民开展的传统武术文化与健康促进的专题讲座、技术培训、展演排练等专项活动,形成社区文化特色,实现“一区一品”文化工程。张氏大洪拳努力建构与社区居民在日常行为和心里层面之间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在“手把手”教拳的日常生活中切实地实践传统文化活动,保持社区居民身体的“物理在场”;另一方面,借由教拳行为的实施来组织生活、规范生活、美化生活,保持传统文化认同的“意义在场”。与此同时,张氏大洪拳也成为社区的一种“社会文化符号”,作为社区组织而不断地进行着社区治理意义的生产。然而,城市社区民间武术团体虽在健康促进与文体展演方面日益专业化,但在其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化方面尚未完成。因此,如何激发广大社区居民对像张氏大洪拳这样的非遗“社会文化符号”进行意义生产和意义阐释的积极性,而非被动的符号消费者,亦是其“意义在场”的重要问题。

3.3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城市民间武术传承人

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不是一般的协商共治,而是服务型治理”^[19]。既有“三社联动”研究认为,社会体育指导员要全职融入社会体育组织,为社区体育指导工作提供人力资源保障^[20]。因此,当前社会体育指导员存在的依据和目标是以满足社区及其居民的体育需求为宗旨,其介入社区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地参与合作,利用社区资源,解决社区问题,增强社区凝聚力,促进社区发展。城市民间武术传承人作为社区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其专业知识、价值伦理和工作方法是以“活动”的形式来开展工作的,一方面满足个体健身休闲与健康促进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活动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

田野调查获悉,张氏大洪拳非遗传习基地,落于瑶海区华府竹丝苑社区,该拳种共同体的核心成员中有3位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从江苏沛县跟随

孩子来合肥的卜宪武,从黑龙江鹤岗跟随孩子来合肥的陈安峰,包括张世宏在内,3人都是幼年习武。几十年拳不离手地习练大洪拳,对武术有着切身的健身体验与传承不息的责任感。每周在固定时间内前往社区练功场地,针对社区内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与部分居民子女放学后无人照看等问题,分别设计了中老年人与少年儿童的张氏大洪拳习练指导项目,一方面,通过武术招式习练来摆脱紧张压力、消除精神疲劳、平衡生活节奏以及缓解机体衰老,发挥武术健身功能,并获得心理愉悦、享受社会生活以及启发人生意义,发挥武术修身功能;另一方面,通过武术招式习练来规范身体姿态、克服畏难情绪、培养文化自信、发扬民族精神等武术对少年儿童的身体教化功能。通过武术传承人专业性的社区健身活动带动居民广泛参与,促使张氏大洪拳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社会资本;同时,优质的社区服获得社区居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因融入现代城市生活而给城市民间武术发展提供了宽阔的生存空间^[21]。

4 结语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城市民间武术作为社会性生活文化内容一直生存于城市社区之中,对居民有着情感性和易接近性的特点和功能。借助滕尼斯的共同体概念,城市民间武术以拳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以武术健康休闲为社区服务内容,将城市居民中武术文化爱好者与健身者集为一体,并以师徒与师兄弟关系类比“家庭的血缘性”、以持久的拳场为生活中心、以武德修为共同遵守的信念,以超越私人利益的公共文化服务为共同目标与责任。而城市民间武术是通过“依法参与、健身服务”的2类原理,“主体行为、人才资源与专业知识”的3种要素、“中老年健康促进、青少年身体教化、社区文体展演、武术技能培训”的4大方式参与社区治理的。与此相应,城市民间武术在“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机制中,将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与社会体育指导员建制相结合,在社区文化共同体的营造与服务社区居民的平台建设中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从而开拓自身发展渠道与发展质量。

参考文献:

- [1] 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7(2):159-169.
- [2] 严志兰,邓伟志.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路径创新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15(4):40-48.
- [3] 黄龙光.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J].思想战线,2017,43(1):150-155.
- [4] 戴国斌.文化自觉语境中武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5):65-69.

生学习,从而有助于教师教学,进而有助于金融管理专业建设。可知,教学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一直在路上,我们需要不断前进。

3.2.2 课程改革的模式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对比对照组,观察组1和观察组2均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进步。观察组2比观察组1的教学模式更有助于学生学习。可见,校外企业实训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教学,但究竟把实训课程全部安排在企业,还是企业实训占更大比重等,我们仍需不断尝试,不断探索,找出一种更有效的课程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 吕佳,王苗,史春玲,等.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探索——基于“知与行”理论的视角[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8(6):89-92.

[2] 谭金城.试论高校教学改革现状及趋势[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8(12):41-43.

[3] 张骅宇.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人力资源管理综合实训课程为例[J].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5):48-51.

[4] 陈琴,张德容.研究性教学模式下会计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究[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8(12):76-77.

[5] 李香萍,袁洪华.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高职商务谈判课程改革与实践[J].中国商论,2018(12):190-192.

[6] 马倩倩.以岗位为导向的构成设计改革与实践研究[J].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2018(6):62-64.

(责任编辑:曲继鹏)

(上接第83页)

[5] 花家涛.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传承研究述评[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9(2):194-197.

[6] 张士闪.民间武术的“礼治”传统及神圣运作——冀南广宗乡村地区梅花拳文场考察[J].民俗研究,2015(6):38-47.

[7] 田兆元.论端午节习俗与民俗舟船的谱系[J].社会科学家,2016(4):7-13.

[8] 胡光锋.实战绝技:三晃膀秘解[M].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2006:4.

[9] 彭兆荣,李春霞.我国文化遗产体系的生成养育制度——以三个文化遗产地为例[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11.

[10] 于江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技艺——析斯多亚派的技艺概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5):73-78.

[11] 朱以青.传统技艺的生产保护与生活传承[J].民俗研究,2015(1):81-87.

[12] SALAMOM L M. Rethinking public management: third-party government and the changing forms of government action [J]. Public Policy,1981,29(3):255-275.

[13] 李雪萍,曹朝龙.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J].城市问题,2013(6):85-89.

[14] 赵旭东.仪式性竞争与第四种权威——政治人类学视角的民间权威与公共性支配的社会逻辑[J].西北民族研究,2017(2):25-40.

[15] 景怀斌.德性认知的心理机制与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2015(9):182-202.

[16] 林闯钢,尹航.走向共治共享的中国社区建设——基于社区治理类型的分析示[J].社会科学研究,2017(2):182-202.

[17] 郎友兴.从小区到新故乡:社区文化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J].浙江社会科学,2013(5):76-82.

[18] 颜玉凡,叶南容.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因素[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7-66.

[19] 王思斌.社会治理结构的进化与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6):30-37.

[20] 向祖兵,李骁天,汪流.社区—社会体育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联动运行机制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9):23-28.

[21] 杨小凤,李建国.城市民间体育文化的认同与表达[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6):75-78+83.

(责任编辑:蒋召雪)